

时代在前进，诗人的形象也在随之改变……

我的不同寻常的诗友们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周文彰（口述） 邢佳璐（整理）

亲历·亲见·亲闻

提到诗人，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风豪迈洒脱的李白？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杜甫？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境豁然旷达的陶渊明？

在我们心中，诗人无一不是风流倜傥、文人雅士之辈。然而，在我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期间，却接触到了一些并不典型的诗人，他们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寄情诗歌、表达自我。

热爱抵万难——“窑洞”诗人胡少杰

“脑瘫，它占据着我的身体，也改变了我的生命；它剥夺了肉体自由，却给了我精神自由。”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胡少杰的年轻诗人，今年只有26岁，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名叫胡家吃磨的自然村。我通过中华诗词学会残疾人诗词工作委员会认识了他。

胡少杰是早产，出生时因为大脑缺氧，导致重度脑瘫，全身无法动弹，20多年来一直被“禁锢”在轮椅上。他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帮助，只有一条腿勉强能动。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挣钱，他就与年迈的爷爷奶奶朝夕相伴，对于他来说，走出窑洞都是奢侈，只能练习用脚趾打字。

在网上交友的介绍下，胡少杰偶然了解到诗词，并进入网校学习。连学都没上过的他，从零开始学习格律诗，踏入了诗词的世界。

“凡人莫看残身朽，我自逍遥避且狂。”病情严重时，胡少杰呼吸困难，有时候会因缺氧而晕厥。然而身体所承受的困难越多，他越能从生活的点滴中发现美好，从诗词中获得力量。陪小外甥女玩泥巴，他写出：“我醉午风迷，小儿揉紫泥。童心今忽起，笑到日偏西。”坐在电动轮椅车兜风，他感慨：“残阳半落漫天红，银马初骑试逐风。心向云间千里去，今须学步短墙中。”就算身在床榻，也要道出：“常在病床无奈何，三魂七魄互干戈。面朝天帝长声笑，一半神仙一半魔。”身虽不能动，但诗词给了胡少杰心灵的自由，这种力量足够冲破身体的桎梏，让他翱翔于天地间。

诗词不仅为他带来精神的力量，也让他收获了心灵的共鸣。通过网络，胡少杰认识了一位陕北女孩。两人经历相似、精神契合，经常在网上以诗寄情。女孩写“十里桃花任君赏，诗人自古爱风流”，胡少杰和“纵有桃花十余里，唯怜一朵在心头”；女孩写“愁丝几缕无由



▲“窑洞”诗人胡少杰

结，独倚西窗望夕阳”，胡少杰和“晚云如解心头事，不该殷勤送夕阳”。虽未见过面，但通过诗词，两人编织着爱情之网。

甜蜜的日子随着2021年底的一条短信戛然而止——那是一张死亡证明：胡少杰的精神伴侣因病突然离开了人世。胡少杰悲痛交加，写下多首悼亡诗：“佳期只觉是寻常，捉弄娇憨小醋娘。噩耗传来久无语，月光应照短松冈。”“当时写罢绝情诗，泪湿红笺一霎时。而今再看痴心句，肝肠寸断已然迟。”……以诗寄情，是他最好的宣泄途径。

2024年6月27日，胡少杰的诗词集《最向东坡最好春》出版，在榆林市图书馆举行的发布会上，我以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的身份视频致辞。胡少杰得到了诗词学会、当地政府、残疾人联合会等多方面的关爱。

对胡少杰而言，诗词就是带他飞翔的翅膀，纵使生活万难，只要心中有寄托，热爱可抵万难。

苦难中生花——保洁员诗人汪雯

“身健在，且加餐。疗伤煮字志尤坚。吾生多舛寻常处，笔意人生别有天。”在那难忘的抗疫期间，扬州市诗词协会的微刊让我认识了汪雯。55岁的她，身材瘦弱、目光灼灼，是扬州一家工厂的保洁员，生活中的她，毫不起眼，却已是一位创作了2000多首诗词作品的资深诗友，在网上拥有众多共鸣者，并被业内誉为“悲情诗人”。

汪雯从江苏省盱眙的乡村里走出来，自小喜爱文学，也曾对生活有过美好的畅想。一场失败的婚姻不只给她留下了身上的伤痛，更多的是心灵的苦楚。离婚后，汪雯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2018年初，在她做了人生中的第7次手术——乳腺肿瘤切除之后，30岁的大女儿也因乳腺癌进了手术室，每月需自费的医疗费用就好几千元，可她的退休收入每月只有2000多元，不得已只能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做起了辛苦的保洁工作。

然而生活仿佛不肯就此放过汪雯。2020年7月，她在上班的路上遭遇车祸，颅骨破裂、锁骨粉碎、肋骨折断、肝脏破损……至今，她身体里



▲保洁员诗人汪雯

还带有手术留下的钢钉。

“有人问我修行法，只种诗花养气神。”长夜熬诗，煮字疗伤。每当深夜，汪雯仿佛变回了那个几十年前热爱文学的少女，在创作中与内心最本真的自己对话，用生活的苦难当作养料，将苦难熬成字句，用诗词疗愈心境。

“逆境何尝不是性格的试金石，在境遇里我看似输掉很多，却让我赢来一颗百折不挠的心。”生活虽艰难，汪雯却始终有一颗乐观积极的心。2021年，扬州疫情暴发，汪雯是为数不多坚守岗位的员工。每日近两小时的上下班通勤路，看着空空的扬州城，让她心生诸多感慨，在完成保洁工作之余，她创作了50余首抗疫诗词：“大疫来时逆行影，严妆流汗苦炎蒸。重重关口源头阻，不让瘟虫机可乘。”“位卑国事系于心，常使诗人感慨深。写到几分情动处，眼中已是泪花滴。”……一首首深夜创作的抗疫诗词，让人们通过诗词了解到了疫情下的扬州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汪雯弱小身躯下所隐藏的巨大能量。经过扬州市诗词协会推荐，汪雯成为了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

2022年初，汪雯被推荐到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诗协专司诗教工作。在街道诗词协会的帮助下，她将自己的2000多首诗词作品整理成《汪雯格律诗新选》（上下册），同年5月，由街道诗词协会出版。

从煮字疗伤到寄情家国，诗词不仅

让汪雯摆脱了生活的苦难，更让她开启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星星燎原火——中国第一个农民散曲社

“泥腿跨进文化门，荷锄有兴吟诗文。街上才搭诗曲台，田头又闻平仄声。”这是原平农民散曲社的作品。该社是一个由农民自行发起的诗词组织，2008年8月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农民散曲社，社址在山西省原平市王家庄乡永兴村。

王文奎是原平农民散曲社的创始人，他是永兴村村民、退休教师。多年来，凭借对散曲的喜爱，王文奎骑着一个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向村庄邻里讲散曲、谈民歌，把田间地头干活、树荫底下乘凉、墙根下晒太阳、麻将桌边打牌的村民们聚在一起，挨个普及散曲文化，讲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原平农民散曲社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内活动，比如“夫妻同写诗”“姐妹齐登台”“父子打擂台”等散曲比赛；开设了“传统文化大讲堂”，免费为全市各乡镇散曲分社社员进行辅导，现在已举办1000多场；将诗词成果编辑成册，先后出版了《兴农曲》《和谐之歌》《山水情韵》等10多册农民诗曲集……散曲文化像一阵清风，吹进了原平村民家。

原平农民散曲社现在有社员300余人，分布在全市18个乡镇的103个村庄社区。其中，有150名山西黄河散曲社社员，61名山西诗词协会会员，14名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写诗作曲迷心窍，三餐饱饭嚼诗道，痴情半夜背背调。”通过社里举办的各种活动和诗友们的互动交流，散曲社的文化支流散播得愈发广阔。2015年11月，原平市农民散曲社社长邢晨在第三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讲述了乡村文化在自己身边活化发展的故事，面对中外嘉宾进一步讲述散曲文化“破圈”“出圈”；2016年，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原平市“中华散曲之乡”称号；2021年，在中华全国“金莲花散曲艺术节”大会上，原平市农民王文奎和张玉武获得了“中华散曲之家”荣誉称号；2024年4月22日央视17频道播发了农民散曲诗友们的专题片。

原平市农民通过朴实的文字，展现了新农村村民的文化风貌，将我国民间民俗文化风情传播到了更广、更远的舞台。

一点感想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叙述脑瘫诗人赵秋凯痴迷诗词的故事，盲人诗人周坚桥屡获诗词大赛奖的故事，打工诗人阿雪雷诗中取乐工余写诗的故事，轮椅诗人刘向东东残患残的故事，屡获科技奖的院士诗人王玉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故事，中小学教师、退休翁媪和各级诗词组织坚持教学、以诗化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我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以来最感到刻骨铭心的故事，从中，我进一步深刻地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华诗词的热爱，深刻地体会到了诗词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的岗位上，我会和各级诗词组织一起，继续寻找和扶持“并不典型”的诗人们，动员各方社会力量支持和关爱他们，让他们成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的独特力量。

教育，后来虽然对旧文化有一定反思，可心灵深处的积淀常常会在特定的环境中释放出来。更重要的是钱玄同有一种特殊心态，即希望通过个人牺牲堵住守旧者的嘴巴，以换取社会观念的更新和子孙后代的幸福。

在谢绝别人纳妾的建议后，钱玄同说过这样一段话：“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继父，父继子，子继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些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护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

不管我们对钱玄同“思想上新，行动上旧”的“觉新性格”持何种态度，他那种为了子孙后代幸福甘愿奉献自己的无私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也大大超出了《家》中的觉新的境界。

文人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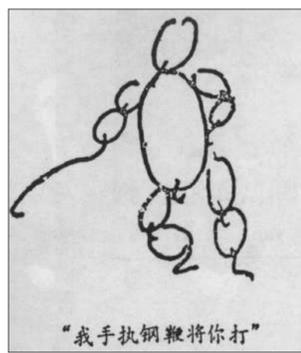
瞿秋白绘制阿Q漫画

周惠斌

瞿秋白出身书香门第，叔祖父瞿廷韶、父亲瞿世玮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画家，他因此自幼学习诗文书画，传统山水画很见功力，迄今有两幅作品存世：一幅是1916年，瞿秋白17岁时绘制、赠送给表妹金君怡的《江声云树图》（常州博物馆藏）；一幅是1919年，为挚友李子宽所创作的《松风琴韵图》（上海博物馆藏）。

1931年后，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尽管此时他已离开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将他作为“共党要犯”。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瞿秋白夫妇在上海曾多次遭到国民党的围追、搜捕，他为此辗转躲避。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将瞿秋白视为知己的鲁迅，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将自己的家作为他们最可信赖的庇护所。

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第二次来到鲁迅家中避难。瞿秋白对鲁迅的著作素有研究，他撰写1.7万字的《鲁迅杂感集》序言，是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献。瞿秋白对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也有深刻的见解。这次避难中，瞿秋白绘制了两幅关于阿Q的漫画。其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堪称既抽象又写意“阿Q漫画”，整个人物由10个大写的英文字母Q，巧妙构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成，包括头、身体各一个，四肢各两个，共10个，构思独出机杼，造型夸张传神，令人莞尔。画面左边，前臂上的一个Q字，其一撇特别长，略有弯曲，形似钢鞭，非常契合小说中阿Q的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又可看作主人公阿Q临终签字画押的那个没有画圆的“圈儿”。整幅漫画线条简洁，想象奇特，妙趣横生。

这年春，鲁迅将清代何瓦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联语赠送给瞿秋白，印证了他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珍贵情谊。

一枚银币的启示

崔鹤同

1962年夏，郭沫若到厦门参观郑成功纪念馆。馆内的工作人员向他请教一枚银币上的花押，他非常重视，认真考察研究，认为花押上有3个字，判断其中两个字是“成功”的合体，其余一字不能解。为此，他专门在厦门大学召开座谈会，向厦大教授请教。

厦大一位副教授认为这3个字应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体，因为郑成功曾被隆武帝赐姓“朱”，称为国姓爷。郭沫若以为有道理，非常高兴，他回到北京，又在历史博物馆发现一枚同类银币，并将这一发现告诉吴晗，说这枚银币的发现，对研究郑成功治台的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

吴晗当天就打电话给历史学家苏

双碧，要苏双碧去请郭沫若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为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历史问题讲座”讲一课。第二天上午，苏双碧来到西四大院胡同郭沫若住处。当时郭沫若正在替北京市人民工作委员会委员一位领导题字。苏双碧说明来意后，郭沫若爽快地答应了，并在一个牛皮信封上写了讲题：《从郑成功银币的发现看郑成功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个题目本来很枯燥，但郭沫若却讲得很生动，历史博物馆礼堂挤得满满的。演讲前，他出示了这枚银币，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从一枚银币开始，经郭沫若的发现和与研究，中国银币的铸造历史由道光年间上推了将近200年。

华罗庚的“贵人”

王剑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的成就，与几个“贵人”的相助是分不开的。

1923年，华罗庚进入江苏金坛中学读书。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常常因思考问题而坐在教室里纹丝不动，同学们都称他为“罗呆子”。数学老师王维克发现华罗庚思维敏捷，做学习题时往往改了又改，其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独具慧眼的王老师开始留意这个学生，觉得他很可造就，便经常把他带到家里“开小灶”。

王维克对华罗庚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他“不像奶孩子一样，把食物嚼烂了喂，而是引他入门，想办法引起他吃好东西的兴趣。同时也不抱着他走，而是像牵牛一样，让他自己摸索，只在拐弯处给他指引一下”。在王维克的引导下，华罗庚的数学进步很大。期末考试时，华罗庚的数学是免考的，王维克会给他专门拟一个论文题目，让他回家去写。

1930年春，华罗庚写出论文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并投给上海《科学》杂志。主编王澍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华罗庚的这篇论文，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就把它刊登在《科学》15卷2期上。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翻阅《科学》时，看到了华罗庚的这篇文章，就向身边人打听作者的情况。当熊庆来得知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颇感意外，更觉难能可贵，毅然邀其到清华大学工作。起初，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助理员，负责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读完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两年后，又破格担任助教，继升任讲师，并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年仅28岁即任西南联大教授，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

《科学》敢于发表一位20岁自学青年的论文，颇具伯乐荐举之功。王维克、熊庆来等人对华罗庚的培养，也深显老一辈学人不拘一格的育才方式。

吴稚晖的俭义人生

周星

吴稚晖一生秉持俭朴之风。每日两粥一饭，饮食大素小荤。衣裤脱线了，他自己动手缝补；家里的烧饭、洗衣、晾晒之事，也都由他自己操持。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吾生也贱，能做卑事。”

1941年起，他开始卖字鬻书，收入渐渐丰厚起来，可即便是这样，素菜里多了几丝肉，他都会觉得是浪费，再三叮嘱家人要节约。然而，当接到从法国巴黎逃难到葡萄牙里斯本的许思园（青岛大学教授）发来的急难电报时，他毫不犹豫地即刻提取1.6万元（折合美金800元）存款汇了出去。

他的钱一直存在银行里，在物价飞涨的时期，大家都对他感到可惜。有人劝他买些物资储存起来，待价而卖。他却坚定地表示：“宁可存银行吃亏，要我囤积居奇发国难财，害国害民，我宁愿饿死，如朱熹说的‘失节

事大，饿死事小’呀！”

1945年，吴稚晖80岁生日，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主动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共黄金十两，他坚决不肯接受。最后在他的同意下，全部赠给了家乡雪堰桥南中学用于建造校舍。他自始至终坚守着“非义之财不贪，无功之禄不受”的原则。

抗战初期，众多亲友熟人逃难进川，纷纷集中到他的住处，他热情地一一招待，为大家提供食宿和饮食，瞬间家里就像一个难民招待所。对于生活困难的人，他慷慨周济；对于无力升学的人，他全力资助。有人称赞他有孟尝君之风，他却笑着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是乙丑年），还债牛（乡人俗语）。”旁人很是奇怪：“你有什么债要还呀？”他风趣地回答：“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吴稚晖俭朴自律，却又在他人需要时倾囊相助，尽显大义与慷慨。

钱玄同：可敬的“觉新”

游宇明

1917年至1927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任导师，积极向《新青年》投稿，他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其言辞，在今天的看来，甚至不无偏激。然而，同样一个钱玄同，在生活中却非常执守旧礼。

钱玄同出生那年，其父钱振常已62岁，哥哥钱恂已经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钱恂夫妇生活，习惯于凡事都要禀命于兄长。他视兄嫂如父母，礼数周到。其妻子是哥哥选定的，他不乐意，却不敢当面表示异议，更不敢反抗。每到阴历年，还携妻儿女去哥哥家拜祖先。

钱玄同为《新青年》撰稿，千方

百计瞒着家人，生怕哥哥看到这本杂志。钱恂曾任清国驻日、英、法、德等国公使或参赞，爱吃西餐，只要有空，钱玄同一定会做跟班，陪兄嫂去德国饭店吃饭。他的嫂子单士厘出过洋，是最早裹着小脚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80高龄时想编一本清代闺媛诗文，钱玄同不辞劳苦亲自复印、校对，还为此书设计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钱玄同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毕恭毕敬。1932年章太炎到北平讲学，在日本跟随其学经学的钱玄同特地前去侍奉。因听讲者多为北方人，听不懂章太炎的余杭方言，每次讲学，都是章太炎讲一段，钱玄同再用普通话“翻译”

一段，其他门人或写黑板或倒水。要知道当时的钱玄同已被人视为文字学方面的大师级人物。若干年后，钱穆写到这件事时，对包括钱玄同在内的章氏旧门人之“拘守旧礼貌”依然艳羨不已。

钱玄同在思想与行为上的矛盾，使人不自觉地联想起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新。觉新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内心有人权、平等、独立等等观念，向往自由恋爱，实际生活中却恪守封建礼教，以长辈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对其摧残青年人幸福的行为一忍再忍。显然，钱玄同也具有这种“思想上新，行动上旧”的性格。

钱玄同的内心矛盾与其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了重孝道、讲等级、尚秩序的传统

钱玄同：可敬的“觉新”